

左
随

2000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年 选 系 列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策

2000 随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年 选 系 列

漓江出版社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笔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0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杜渐坤,陈寿英选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1

(年选工程·中国年度最佳系列)

ISBN 7-5407-2663-6

I .2... II .①社...②陈... III .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1900 号

2000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

杜渐坤
陈寿英 选编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96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000 册

ISBN 7-5407-2663-6/1·1607

定价: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编者的话

这是继《'99 中国年度最佳随笔》之后编选的第二个“年度最佳随笔”选本。在第一个选本里我们曾经说过——

我们编选的，主要是带有“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性质的“思想性散文”和“文化性散文”。我们如是编选，一是想与“年度最佳散文”选本有所区别，二是希望能给读者更多一些学养上的滋润和思想上的启迪。

不过，无论如何编选，作品中是否蕴涵着作家精到的独立思考 and 自由言说精神，始终是我们最为关注的。因为我们以为，舍此不能见出作家的思想、学养、胸襟、禀赋和个性，白纸黑字印出来的文章，也算不得真正属于作家“自己的”好文章。

然而，在一个有着数千年习惯于只依靠一个大脑想事的古老的封建传统，而现在还不能说这个传统已经完全变了的国度里，这样的“好文章”，也并不是那么触目皆是的。

在这一本里我们要说的，也还是这些话。

这一本是从全国大小各家报刊中遴选出来的。初选为一百来篇，因篇幅所限，再选三选就剩下这 60 篇了。但尽管如此，我们仍无意评说这些作品是否“最佳”，作家们都思考得言说得如何，也无意探究他们在 2000 年思考时言说时的境况和心态怎样。历史是严正的，时间已翻过一页。于此想说明的只是，从来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的作家，大多是严肃的、正直

的、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艺术良知的，他们的作品大多能脱出媚俗，并于世道人心大有补益。假若这一本也可做如是观，那么，就让这些作品，长久地留在人们的阅读中吧。

杜渐坤 陈寿英

2000 年岁末

目 录

编者的话	杜渐坤 陈寿英(1)
细节的警示	吴小龙(1)
显微镜及其他	葛兆光(10)
中国人为什么好吃?	艾晓明(16)
笑话天道	吴 思(29)
《叫魂》的多余话	张 鸣(36)
反贪的限度	陈四益(43)
冲不出的亚洲	严 秀(47)
为人类的前途担忧	
——《奇妙的新世界》中文版序	虚 中(53)
好社会	李洁非(62)
倒读历史	金克木(68)
预言和谶言	
——读李光耀先生在'99《财富》论坛年会上演讲的随想	舒 展(75)
“五四运动”:被阐释的与被遗忘的	杜圣修(80)
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	王晓明(102)
“打江山”与“坐江山”	王彬彬(121)
怕读血写的书	朱 正(128)
百家争鸣祭	曾伯炎(131)
我们应当记住	吴 江(137)
读《欧洲书报检查制度的兴衰》	林贤治(144)

两本论自由的世界名著..... 湛 震(151)

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新文化运动再研究札记之一..... 袁伟时(157)

坐着的权利..... 狄 马(167)

多说民主的好处..... 谢 泳(170)

大学的自治传统..... 阎光才(172)

宜将直笔写春秋

 读《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钱伯城(177)

反思百年..... 戴文葆(193)

吴晗《论说谎政治》读后..... 魏得胜(202)

从马寅初的那个夜晚说起..... 谢 云(205)

毛泽东与《文艺报》的《再批判》..... 阎 纲(212)

《王实味冤案始末》序言..... 李 锐(215)

生命的浪费:沈从文的内心独白..... 雷 颐(219)

说起《祖国进行曲》..... 邵燕祥(224)

灯谜趣谈..... 何满子(229)

留待人间说丈夫..... 王伯庆(232)

内部对话中的观念同一性

 以胡风为例..... 孟繁华(237)

“千夫指”何以对“孺子牛”..... 王为政(243)

胡适为何被围剿..... 刘兴雨(246)

围绕《赛金花》的一次朝野对话

 旧刊今识..... 吴立昌(249)

一世兴衰照眼明

 读《陈独秀诗集》在感..... 袁 鹰(256)

未来世纪的考古索引..... 张石山(263)

枥斋余墨(节选)..... 魏荒弩(269)

李卓吾之死·····	李国文(288)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杨念群(297)
阅读吴宓·····	叶兆言(307)
千古一毛·····	张戡炜(324)
一个归隐者的自白·····	梅桑榆(334)
把栏杆拍遍·····	梁 衡(338)
军 歌·····	夏晓虹(345)
磁器店中的猛牛·····	许纪霖(353)

太平天国究竟如何?

——从马克思《中国记事》一文谈起·····	左焕奎(361)
-----------------------	----------

假作真来真成假

——太平杂说·····	潘旭澜(369)
强盗逻辑流氓腔·····	海 笑(374)
《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	绿 原(381)
果戈理的预见·····	蓝英年(389)
我读蓝英年·····	牧 惠(397)

不妨滑稽一下·····	张 洁(403)
静看鱼忙?·····	李敬泽(405)
心窍黄尘塞五年·····	王树增(414)
指缝间的沙粒·····	张大威(421)
失乐园·····	吴劲薇(427)
一页的翻过·····	张承志(430)

细节的警示

吴小龙

古希腊一个哲人说过,读史使人智慧。这话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毛泽东就一生读史,他从中既读出了智慧,也读出权谋;既读出了激情(如读《南史·陈庆之传》“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也读出了迷误(如在大跃进时,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大讲《张鲁传》),因此不可一概而论。大体说来,读史可以有三种,一种是如马、恩之读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研究西欧封建社会结构,从而进行对人类的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思考,形成自己的历史哲学。这实际上不是去得到智慧,而是在创造智慧。这是大思想家、大学问家的理论创造过程,它实际上与“读史”无涉,也与常人读史异趣。第二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读史”,对中国人而言,也就是过去的二十五史和现在形形色色的“通史”、“史纲”。这种读史,似乎也不能说无用,但我想,它更大的“用”不是给人“智慧”,而是给人“信仰”——或者是纲常伦理、王朝正统的教化,或是“历史规律”、社会发展方向之类的信念。这从最好的方面看,也只是前一种历史智慧的创造之后的普及版,是其运用和解说。这种读史,人们或者也可为自己明了了“天下大势”、“历史方向”云云自我振奋一番,但说到底,它给人的不是智慧而是迷信。还有一种,是鲁迅曾反复提倡的读野史:稗官野史和笔记丛录——这野史的“野”,当然不是指那信口胡诌的小道传闻,如近年人们热衷炒作的什么“文革纪实”;这种“野”,是指正史为了其政治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摒斥不取,讳莫如深,乃至文饰改纂的实情、细节。它也包括一些其时其事的文件史料,这些,实际上“质”得很,一点不“野”。例如鲁迅提到的明成祖“靖难之役”后的大清洗,有处理某人尸体的批示:“抬出东门外着野狗吃了,钦此!”寥寥数语,比什

么都更能让我们明白当时的文明与野蛮、政争的残酷,和这位皇上的观念、性格和心态。这种读史,能否读出智慧也不可说,也许也只能读出“古今皆然”的无望和牢骚满腹,但我想对于认真的读者和思想者,它纵然不能就展示智慧的高峰,至少也提供着启发思考的警示。

以这种方式来看这 150 余年的历史,给人的感觉恐怕就与读正史大不一样了。自正史教科书看这百来年,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前半段不断下降的轨迹和某个转折点后不断上行的轨迹。那看来是一段与今人相去甚远的历史,无论其不幸,还是其奋争,还是其辉煌,都与今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恍若隔世(它也确实已“隔世”),只有它所预示的辉煌,或者与今人相关。这样看历史,只能支撑一种虚骄的乐观、助长国人本已擅长的健忘——遗忘不幸,也遗忘教训。而一旦我们想从这正史之外多探究些历史真实,以补充那条太嫌简略的线索而形成有血有肉的生动的历史画面,那么,由细节记载构成的真实历史场景大约将不免让人出一身冷汗。我们会清楚地看到那段历史并没有过去,百年前的先人的经历和今人几乎毫无二致:睁眼看世界的历程和认识的递进与后人相似,所做的事和曾有的辉煌相似,面对的弊端和一筹莫展的困局也相似。他们的失落不能不让人警惕:那一页究竟翻过去了多少?

我们不妨借助细节再来回顾一下这段经历:

大约 160 年前,中国开始了一场历史变局:一个从未听说过的“蕞尔岛夷”,不知从何冒出来,仗着他们的“坚船利炮”,竟然打败了我们这个有着皇皇数千年历史和文治武功的“天朝上国”,乃至要我们割地赔款!这个“二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中国人震撼了,于是第一次睁开眼看世界。而在此之前,我们是除了周边几个臣服纳贡的“蛮夷”之外,完全不知还有所谓四海五洲的。——当初面对接踵而来要求订约的列强,有的廷臣忿然道,根本没有什么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之类国家,那全是英夷为了骗取赔款,瞎编出来凑数蒙人,蒙骗圣听的!后来才发现世界果然很大,于是就有《四洲志》、《海国图志》等书的编撰。国人从这些书里知道了:英咄咄“俗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艺灵巧。纺织器具俱用火轮、水轮,抑或用马,毋须人力”。还有,佛兰西“俗尚奢华,虚文鲜实。精技艺,勤贸易,商船万

四千五百三十”。他们还知道了世界上还有欧罗巴洲、墨利加洲(美洲),有变法而强的俄国“比达王”(彼得大帝)。这些介绍中那种谈论域外奇闻的惊异神情,令人不禁想起文革刚结束的七十年代末,开放伊始,中国派出的一些出访人士,归国后做的一系列“传达报告”,向国人介绍当时的西方世界,其惊讶不置的口气和在国人中产生的同样惊讶不已的效果与此几乎毫无二致。而最让当时中国官僚震骇的,则是这些夷人的“坚船利炮”所代表的强大武力:“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天下无敌。”于是就刺激了大清朝廷文武中较开明的一部分人物学习西方的急切心理。从林则徐的积极筹划“船炮二事”,到李鸿章的认定夷之优长,仅在“铁甲快船与开花大炮”,一旦中国也有了这两样,“西人即可敛手”,这半个多世纪里,船炮所代表的先进军事技术和装备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和赶上西方的标志。林则徐就曾急切地说,“恐造船不及,则先雇船;恐铸炮不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但他老人家,当年向美国人买了一艘 1080 吨的大船“剑桥号”并装了 34 门英制大炮,却不知用来出海作战,而是摆在珠江口内作障碍物兼炮台,结果是让夷兵爬上船来,连船带炮给开走了。)在镇压国内的太平军时,曾国藩又提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以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左宗棠更从不愿受制于洋人的角度出发,创办福州船政局,力图自制轮船,他说,“臣于闽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后,这成了 19 世纪后半叶国人的共识,而且为此做出了认真不懈的努力。从租雇到购买,到引进生产线自造,想法做法都与今人如出一辙。到 19 世纪末,应该算中国人手中的船炮相当风光的时代了: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四五十艘战舰,其中包括当时在世界上算很先进的重型铁甲舰定远、镇远号(吨位达七千三百多吨,还配备 12 英寸的巨炮和 14 英寸的铁甲。一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海军——包括国共双方——的巡洋舰,似乎都还没有超过这个吨位),这支舰队,当时在世界上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强,居世界海军第 8 位。还建成了旅顺、大连、威海卫、大沽口等新式要塞炮台。当时的淮军也差不多全是西式装备和训

练,而后来荣禄的“武卫中军”里,还配备着连德国军官都自叹少见的克虏伯厂制造的重炮。于是,在当时称得上高科技的先进武器“铁甲快船”和“开花大炮”全都有了,中国的国防近代化已很具规模,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只凭大刀弓箭与洋人比赛。

改变落后挨打局面的急切心情加速着国防近代化的进程,国防近代化的需要又带动了军工、民用等近代工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这些发展对新式人才的需求又产生了同文馆等洋务文化教育事业,一个以自强新政为旗号的洋务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在当时是给死气沉沉的中国带来了许多新气象的,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中兴”,并非全无道理。而且不要忘了,以洋务运动开始到清王朝结束的这半个世纪里,虽然不断地有各种内忧外患的冲击,但自强新政的标榜是清政府一直没有停止过的事业,是其从未改变的既定方针和基本路线,富国强兵更是中国人始终没有放弃过的愿望和努力。可以说,是这些努力的成果,使当时的中国在内忧外患中仍维系着一线生机,当然,后来也是这些努力由于中国的固有、特殊国情而遭受的种种曲折顿挫,最终在风雨飘摇中把清政府送上了末路。而在这终局到来前,它是曾几度像有起死回生的机会的。

洋务运动的成就、局限和失败有过许多论述,这里不用多说。它不是晚清惟一的一次现代化努力,在洋务运动沉寂后,在戊戌和庚子两次大乱后,清政府在其末期还在慈禧的授意与支持下搞过一次“新政”。它经常为人们所忽略,但实际上,它也曾取得不小的成果。当时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如修建铁路(到1911年修建铁路九千二百多公里),发展矿冶业(1911年前40年投资四千一百万元)、机器动力工业(同期投资达一亿六千万元),振兴实业,促进各行业(如榨油、纺织、缫丝、面粉)手工工场向近代工厂企业转变,各地设立商会、开办银行、创办农牧垦殖公司,总之,从路矿工商到实业农垦,各行业都一时间空前发展,出现了一个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都曾在当时世界上引起广泛的关注和高度评价。如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后来代表清政府出使欧美的蒲安臣就说:“我敢断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这几年取得的进步可与中华帝国相比拟。它扩充了它的贸易,改革了税收制度,改组

了军队。它经历十三年的战争而没有发行公债。……在我滞留中国期间，对华贸易由八千二百万增加到三亿。同将来相比，它还只是巨额买卖中的微小的一部分。”这是何等让人兴奋的成就！1901年，当汉阳铁厂出口生铁时，西方报纸惊呼：“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期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勿么么视之。”五十年代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运动似乎都没有得到洋人这么高的评价。他们断定从此中国将崛起于东方：“曩者华人梦昧昏昏略无知觉，弃才于地，不足顾惜。今则狂睡初醒，眼光霍霍，振刷其精神，磨砺其胆略，以搜罗遗利，步武西法，宏兴工业、百废俱兴、一鸣惊人。加以选派学子，游学西方，以备将来回国开浚利源，其处心积虑，大足以使人寝不安席。”据说拿破仑也曾把中国比作熟睡的巨人，担心他醒时将震惊世界。而在19~20世纪之交，由于清末“新政”的结果，不少西方人士居然预言，“在皇太后领导下的中国巨龙正在腾飞，二十世纪必是中国的世纪”！这类话语，中国人在近二十年里已听得很多，相当熟悉，以至于觉得洋人今天对我们真的刮目相看了，不免沾沾自喜。谁也不会想到，一百年前，洋人就已经毫不吝啬地用此类话来恭维慈禧太后领导下的中国了。恭维我们是为了做生意，二十世纪终究没有成为我们的世纪。现在因“巨人睡醒”、“巨龙腾飞”、“中国世纪”而陶然忘情的人，看来并不知道洋人已经这样把我们捧了百来年了。然而，恭维话终究没能帮我们“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

自强新政落空，“腾飞的巨龙”重重摔到地上，几乎是必然的结局。因为，就在我们取得那表面的物质成果时，中国人的思想（从民众的观念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真正转变，跟上时代；中国的体制并没有转换到适应近代工业发展的轨道上来，中国的政治极其腐败糜烂。在清末的“新政”开始时，慈禧显然已看到形势严峻，面临统治危机，故在谕旨中说：“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听起来颇有危机感和清醒认识。改革在那时就已经是时代的要求：“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他策。”其实，她这里“为臣民计”是虚文，“为宗庙计”

才是实情。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满洲勋贵，此际愿意搞“新政”，搞“立宪”，目的只如端方所说的，是“以弭少数鼓励排满之乱党”，以期“永固皇基，常昭法守”，以维持他们的利益，维持他们的统治，因此他们可以学西方的科学技术，甚至“政艺兼学”，学习“西政之刑狱立法”、“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但对西方的思想文化，则是坚决拒斥的，这就是慈禧上谕里所说的“可变者令甲令乙”，“不易者三纲五常”，要坚决维护封建制度所赖以生存的纲常伦教思想和制度，坚决拒绝西方价值观念的传入，这是清王朝在意识形态上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前提下，所学的“西政西艺”，能学到什么程度，我们不难设想。在这种始终坚持的封建意识形态笼罩下，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虽然已是官方的国策，在举办过程中仍然遇到重重阻挠，思想较为开放的洋务官僚也经常受到顽固派的诋毁谩骂，很正常的改革举措都需历尽艰难才能实行，还经常爆发一些重大但却可笑的争论。例如，洋务新政中，奕訢代表总理衙门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拟选取20岁以下满汉举人和五品以下科举正途出身的“年少聪慧”的京官入馆学习天文算学，结果引起轩然大波。顽固派认为把西学引进科举圣殿、让科举正途出身的人拜夷人为师，显然是危害极大的严重事件，于是交章奏劾奕訢。顽固派首领、大学士倭仁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只要朝廷能养臣民气节，即可御灾平寇。而且“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术，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而令正途人员以夷为师，势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因此要反对这种崇洋媚外的精神污染。倭仁的话，洋溢着何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体现着何等鲜明坚定的政治立场！这是一百年前的“‘风庆轮’事件”。这类浩气凛然的议论似非倭仁所独有，在此之前，杨光先就提出“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在此之后，“文革”中又有一句名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相去百数年，卫道家们的思维逻辑如此相似，令人叹为观止。在倭仁的气势汹汹面前，想搞改革的奕訢只好以退为进，称倭仁“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该大学士……自必另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

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该大学士之后……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冑,礼义为干櫓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臣等实未敢信。”言词之间,露着尖刻的反诘和挖苦,文采决不在今日“姓社姓资”的论争者们之下。幸好慈禧这时看来是偏向洋务派的,谕令倭仁另保懂天文数学的中国教师教学,与夷师较胜,将了倭仁一军,搞得倭仁只好狼狈认输:“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一场风波才算过去。除了这种出于封建意识形态捍卫者的横加非议阻挠外,封建制度本身也制约着近代工、商企业的发展。此所谓既有思想问题,又有体制问题是也。封建官僚机构的臃肿,人浮于事,缺少责任心,办事效率的低下,官僚的无能和整体腐败,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政治需要而对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的戒虑和阻挠,官督商办对私人资本的制约和盘剥,这些都导致中国近代私人资本企业不可能正常、健康地发展,而最终终于一无所成。梁启超曾指出,“李鸿章所办商力,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李鸿章也哀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制,遂致一事办不成,良用喟叹!”

更要命的是,这种种“新政”似乎成绩斐然。国势略有起色,取得初步成就之时,虽有个别开明官僚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却无奈整个统治集团已整体腐败,文恬武嬉,贪官污吏遍于国中;政治黑暗,独裁专制肆行无忌,最后断送了一度带来新气象的改革、新政。甲午中日之战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而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慈禧为了自己的六十岁大庆在颐和园大兴土木,挪用了三千万两的海军经费。有的史学家算过,当时慈禧太后的奢靡生活,一天耗银4万两,也就是说,以宫廷半月之费,可购“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之费,可购一艘超级主力舰;一年之费,至少可装备一支高踞世界第六七位的海军舰队。今人也统计过,国人现在一年的公款吃喝,要吃掉两艘航空母舰,看来真异曲同工之妙。尤有甚者,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为了给慈禧建园祝寿,主管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不但挪用海军军费,而且强令各地官员捐献巨款,户部还正式宣布以皇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两年!实际上,自1888年起,中国海军就“未购一艘”了。李鸿章后来抱怨:“使海军经费如数发给,不过十年,北洋军船炮甲地球矣!”而就在清廷“海军不复购铁甲”,“以海军之人以督大工修颐和

园”的时候,日本却在大力扩充海军,专门针对“定远”、“镇远”而设计火炮口径更大的“三景舰”,由日本政府发行海军公债一千七百万日元,日本天皇带头捐款三十万以充军费,又下谕节省宫内开支,支持海军造船,还下令文武百官一律缴纳十分之一薪俸以发展海军,明确提出“一定要战胜定远”的口号。甲午前夕,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厂要把新下水的世界最快、时速23海里的4000吨巡洋舰卖给李鸿章,但李无钱买,结果这条船被日本买去,这就是甲午海战中重创北洋舰队的日本旗舰吉野号。一方是秣马厉兵,同仇敌愾;一方是文恬武嬉,颀预昏愆,战争胜负,这时已可断言。而在战事危急之时,最高统治者照样庆寿,“听戏三日,诸事延搁不办”,如此以国事为儿戏,且挥霍民脂民膏以粉饰太平,权势者可谓天良丧尽。朝政如此,前方将士的浴血奋战又于全局何补呢?

当北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之际,丁汝昌率残舰退守军港,而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在包围了威海军港后,给丁发来了一封劝降书,其中以旁观者的口气,分析了中国之所以战败:“清国海陆二军,连战连北之因,苟能虚心平气以察之,不难立睹其致败之由。……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由致也。夫取士必由考试,考试必由文艺,于是乎执政之大臣,当道之达宪,必由以文艺相升擢,文艺乃显荣之阶梯耳,岂足济夫实效?……当此之时,我国(日本)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胜利者总是从容的,所以能把这阵前的敦促某某投降书写成一篇政论。而作为中国人,至今读之,仍不免令人痛心疾首。

有诗曰:“惊回首,离天三尺三。”百年前国人的经历,看来离成功不远,也离今人不远。随手拾取一些正史所回避不谈的细节材料,就能令人对历史进程有不同的感受,也不难从这些真实情况中得出自己的结论。百年前的变法变政变革,离功成业就,看来似乎曾经并非遥遥,然而终于失败。自鸦片之役以来,国人学习和赶超西方、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不可谓不强烈,对改革派“自强新政”的冀望不可谓不殷,朝野忧国之士的努力不可谓不艰辛,一度取得的成就不可谓不辉煌,然而在中国的“特殊国情”

下,一些困局终究还是拉住了腾飞的巨龙,变法终于功亏一篑。用一位海外史家的说法,这问题在于“科技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的转型没转好。中国失去了及时起步,跟上世界潮流的几次重要机会,结果是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风暴的震荡。成果是太容易让人忘情陶醉的,更何况我们本来就是个喜欢遗忘、喜欢陶醉的民族。粗略回首一瞥,历史的轨迹也还是能让人欣慰和陶醉的,只是深入细节,瞥见许多“曾几何时”的惊人相似以后,我们才不免要问:国人于此又要何以置辞?读史有时能给人一点冷静,给人一点睿智,但并不能就给人摆脱窘困的方法。方法还得问今人。

(选自《上海文学》2000年9月号)